

淮阳历史上的三位名师

□ 李志远

回溯淮阳的历史,曾三位著名的老师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是至圣先师孔子、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五四时期著名爱国诗人徐玉诺。正是他们为淮阳增添了许多文化气息。

关于孔子在陈的故事,很多朋友包括淮阳本地人在内,都只知道“陈蔡绝粮”的故事。一天,孔子想要离开陈国去楚国,陈国的大夫们与蔡国的大夫们发兵合围孔子,使其及其弟子们被困了七天七夜,因而很多人都觉得淮阳人对不起孔子,让他在淮阳受了罪。其实,对此,我是有所怀疑的,我不愿意相信家乡热情友好的先民们会那样做。于是,我翻看史书,查阅资料,得知了一个更接近事实也更为丰富的“孔子在陈”的故事。公元前 497 年的春天,因思想、政见不容于鲁,55 岁的孔子离开家乡鲁国,开始周游列国。他先是去了卫、匡、蒲、郑等国,都不是很顺利、待不下去,甚至还在郑国的东门外被嘲笑为“累累若丧家之犬”。于是,他继续前行,来到陈国,住在现位于淮阳县城东南三官庙的司城贞子的豪宅中。孔子在淮阳受到了很高的

礼遇,有史料为证:“孔子在陈,陈惠公宾之于上馆(《孔子家语》卷第四·辨物第十六)。”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孔子陈蔡绝粮、七日弦歌不止的故事,仅仅是因为当时战乱频发,民不聊生,孔子的绝粮断然不是陈国主观上的原因,绝不是大夫们害怕孔子到楚后发动众合围导致的。这一点西汉孔安国有言:“会吴伐陈,陈乱,故乏食。”国学大师钱穆也为淮阳人正名:“而谓绝粮乃由受兵围,则不足信。”须知,当时的楚国是大国,陈国畏之很久,又加上吴国兵临城下,自顾不暇,怎敢得罪楚国围困孔子呢?因此可推断,淮阳的先民们对孔子是友好的,是亲其师信其道的,不然,孔子的七十二贤中也不会有陈人四贤:子禽、子张、子期、公良孺。绝粮因战乱,困厄显人品。今人漫步弦歌台下,夫子的弦歌声犹在耳畔。

淮阳历史上第二位著名老师,是宋代文坛巨擘、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熙宁三年(1070 年)新任陈州知府张方平,辟苏辙为陈州教授,任期三年。这样,因政见竞争而宦海漂泊的苏辙在淮阳有了安身之所。31 岁的苏辙在《初到陈州》里

说:“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俎豆终难合,读书强欲明,斯文吾已试,深恐误诸生。”“传道愧虚名”、“深恐误诸生”绝对是苏辙的谦虚之语。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就是苏辙在陈州所“误”的诸生之一。熙宁五年(1072 年),张耒游学于陈,师从苏辙,苏辙对张耒厚爱有加、精心指导,并把张耒推荐给苏轼。设想,若没有遇到苏辙,“苏门四学士”会不会少一个也未可知。

对淮阳历史上第三位名师徐玉诺,作家南丁这样评价:“徐玉诺是中国新诗创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是五四新文学灿烂星空中一颗闪亮的星辰。”这个评价丝毫不夸张,徐玉诺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文学研究会会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省跻身中国文坛的第一位新诗人。商务印书馆于 1922 年 8 月出版的徐玉诺新诗集《将来之花园》,是河南省出版最早的一本新诗集,是中国出版史上继胡适《尝试集》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诗集。这样一位现代文学巨擘,于 1928 年 2 月,34 岁时来到位于淮阳的河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

并且在生活稳定后,立即把母亲和家眷接到淮阳,租住在淮阳县城内的庞家大院,此后直至建国前后,淮阳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期间,他虽然在信阳、曲阜、烟台、鲁山等地短暂任教,但淮阳是他的“长期根据地”,是他的家,他的儿女在淮阳成长,他的母亲在淮阳仙逝。

孔子、苏辙、徐玉诺,这三位不同时期的文学巨擘,他们都不是淮阳人,却先后来到淮阳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对于他们来说,淮阳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当年的他们,行走在古淮阳的土地上,心头或许时常会生出“客舍如家客如家”感慨吧!今天的淮阳大地上,依然有很多的异乡从教者。我们能做的是给他们送温暖,让他们觉得心安,能够时常发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由衷之慨。



电影场上的欢笑声

□ 王天瑞

以前的农村,精神文化生活非常匮乏,农民如果能半年看一次黑白老电影,那就是很大的精神享受。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特殊时期,剧团解散了,曲艺“洗手”不干了。那个时候,电影新闻纪录片,只剩“两位明星一个人”;两位明星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一个人是西哈努克亲王。那个时候,电影故事片只有“三战一队一个兵”。“三战”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一队”是《平原游击队》,“一个兵”是《小兵张嘎》。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次,降临黄村的不是暴风乌云,而是和风彩云。这次,降临黄村的不是灾祸,而是福气。黄村来了一个人,老百姓不知他叫什么,只知他姓钟,是上级派来的坐队干部,可他从来没有在村里搞过大批判。有人悄悄问他,从哪里来?是什么官?他反复只说一句话,不是官、不是官。老钟来了不久,黄村人就发现,百姓们一个月就能看上一次电影,虽然还是“三战一队一个兵”,但心里却是格外满足。

太阳偏西,电影队坐着生产队的马车来了。电影场还是在南地——村南头。三位放映员跳下马车,卸下机器,立即忙活起来。首先是挂银幕。放映员们抡开铁锤,打好地脚,架上银幕杆,拉紧银幕绳,撑起银幕布。人们仰面看到那蓝天下高高挂起的洁白银幕,不由得欢欣鼓舞。孩子们更是奔走相告。他们知道,银幕挂起来,幸福马上就要降临了。

看样子,老钟和放映员们很熟悉。不过,老钟只说几句话就匆匆走了。紧接着,放映员们便忙着抬出发电机,摆开扩音机,接上稳压器,吊起扩音器,架起放映机,装好电影胶片。太阳落山,火烧云染红了西天。放映员们熟练而又利索地做着放映前的准备工作。

人们从四面八方向来,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大家互相打着招呼。电影场上,人越来越多,有坐在地上的、有坐在马扎上的、有坐在凳子上的、有坐在鞋上的、有小孩坐在父母肩头上的、有年轻人坐在高高树枝上的,还有坐在银幕后头看“反电影”的……电影场上,说话声、喊叫声、打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叭”的一声,放映机前的大灯泡亮了。“蹦蹦蹦”,老支书拍响了话筒。大家

的说话声慢慢消失了。老支书说,今天晚上放映《地道战》。顿时,掌声响起来。本来,老支书还想说点什么,叫叫好声把他的声音淹没了。无奈,老支书只好宣布,现在开始放映。突然,大灯泡灭了。随之,大银幕亮了。

《地道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战争电影,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河北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新利用地道战的斗争形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在黄村,每当讲起电影《地道战》,无论从何处讲起,很多人都能对答如流。每当响起《地道战》插曲,男女老少都能随之歌唱:“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嘿,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千里大平原展开了游击战,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魂飞胆也颤,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人仰马也翻……”

电影放映结束,虽已时至深夜,但大家仍是兴高采烈、兴奋异常,欢声笑语撒满回家路。

那时,我曾问过玩耍的孩子们,最喜欢看哪部电影?他们异口同声说,张嘎子。《小兵张嘎》,真实地塑造了一位少年英雄。他那刚强倔强却又聪明伶俐的性格,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小观众。尤其是,当群众为掩护他遭受伪军毒打时,他敢于挺身而出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与他们没有关系。”当敌人把他关在炮楼里进行拷问时,他敢于咬住敌人执鞭的魔手。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调皮活泼、天真淘气的孩子,时而不讲道理地堵上胖墩家的烟囱,时而违犯组织纪律将缴获敌人的手枪藏在鸟窝里……他的勇敢令人鼓舞,他的淘气招人喜爱。在黄村,我经常看到孩子们排队高唱《参加八路军》:“打仗最好子弟兵,杀敌全靠自己人,杀敌全靠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大家想要得解放,快快参加八路军,快快参加八路军……”

我问孩子们,看过几次张嘎子了?孩子们说,天天看。我就笑。孩子也笑,笑着笑着就跑远了。

不到一年时间,老钟被调走了,黄村人也很难看到“三战一队一个兵”了,精神文化生活继续匮乏。

然而,当时走进艳阳天,虽然老电影解放了,但农村看电影的热潮并没有再次掀起,因为,电视出现了。

纵横捭阖写乾坤——记著名书法家、“童式书法”创始人童心田

□ 记者 孙智 文/图

初冬的一个晚上,在沈丘县北城的一个农家饭馆,他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地道的土粉皮,旁若无人地大口吃着家乡的杂面角,把花生米嚼得咯嘣咯嘣响。

他如此“吃相”,似乎与他的师政委、大校警衔,作家、书法家的“身份”有点不“相称”;与“金戈铁马”、“温文尔雅”这样的词语有点不“合拍”。

他说:“我的书法艺术植根于故土,来源于乡情,是乡情、乡愁、乡味把我带回到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

他叫童心田,一个吃沙颍河水长大的沈丘人。

当兵扛枪曾是他的梦想。但是,如愿到部队服役后,他却一直从事文职。他给自己准确“定位”,在参加军事训练、成为合格新兵的基础上,开始从事新闻写作和书法创作。最终,他功成名就,历任新华社记者、《解放军报》编辑、《人民武警报》主编、《国家书画观察》总编,并担任师政委、取得大校警衔,同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毛泽东书法研究院执行院长、河南省书画学会执行主席。

童心田先后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能够进入“高层”的“视野”,除了他屡立“战功”外,还源于其受到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以及版权保护中心给予专利保护的“童式书法”。

他的书法章法计白当黑、略略大方,结体内紧外放、优雅美观,笔法起伏跌宕、提按洒脱,墨法浓淡相宜、自然而然。通观其书法形式,大字下面配小字解释,颇有红花绿叶、烘云托月的效果。因其书法独到,故称“童式书法”。

于是,中央文史馆员杨乃寒、中国作协副主席二月河、《中国书画市场报》社长兼执行总编李俊峰等名家纷纷撰文,称赞“童式书法”雅俗共赏、文采横溢。

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认为,“童式书法”既然被版权保护中心给予专利

保护,就必定有其独特之处。

其一,书论支撑。童心田的书论,讲究书法之道贵在阴阳和谐。在谋篇布局上,黑白相间,计白当黑,疏朗有致,舒适美观;在技法笔法上,主次搭配,大小错落,快慢结合,奇正相倚,刚柔相济,有虚有实;在墨法印法上,浓淡相宜,干湿相应,轻重自然,阴阳互生,画龙点睛,相映成趣。

其二,形式支撑。“童式书法”形成了大字配小字的风格,大字是主题,小字是解释,相得益彰,给人以形式创新的美感。作品《家和万事兴》,便彰显了“童式书法”的与众不同。很多书法家都写过类似的词句,但很少有人给予解读。而“童式书法”则从儒释道的哲学要义之高度,从天地、国家、夫妻、身心至宏至微的社会层面给出说法,着实让人领悟书法的真正内涵,绝不只是写字,而是书中有文、书中有道,弘扬国学,传播正能量。

其三,内容支撑。“童式书法”作品体现了书中有人、书中有文、书中有情、书中有道。书法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一个合格的书法家,不仅要练好写字的基本功,更要练好字外功。国学经典、四书五经、唐诗词元曲、历史、哲学、文学、美学知识,书法理论、天地理学等都要掌握,只有这样,创作时才能挥毫泼墨、潇洒自如,弘扬国学,给人以向上向善的正能量。“童式书法”既吸取了国学知识的经典要义,也继承了中国传统书法的优秀基因,还运用了社会发展的时代新元素。

为此,国家邮政局及中国国际集邮网将“童式书法”印成邮票、明信片,在全国公开发行。

童心田的书法诸体兼备,重韵尚法,具有较强的功底、灵气。笔法和结体,直追二王,字里行间,亦有米芾的影子,还有许巍碑加王铎的中原书风,其妙处却在似与不似之间,这当然是融会贯通的结果。童心田书法艺术的造诣,得益于对米芾的用笔结体有精深

的理解和多方位的汲取。尤其是他的行楷写得疏朗洒落、飘逸爽健、瘦不露骨、肥不刺肉,可以说深得米芾精髓。因此,童心田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大字小字均写得很好的“学术型”书法家之一。

童心田的书法,扎根传统,汲取营养,选好角度,破壳而出。在章法布局上,规范、匀称、疏朗、计白当黑、气定神闲,玉树临风、潇洒自如;在结体上,内紧外放、大小错落、奇正相倚、干湿对比、浓淡结合、亦行亦草;在笔法上,起笔重、收笔稳、点如坠石、横若卧龙、近似枯藤、撇比豹尾、勾像长戟;在墨法上,从湿到枯、顺其自然、重墨为主、不燥不火。

清健挺劲、温润雅静是童心田书法的特点。线条清劲,作品《沁园春·雪》中的“外”,“莽”,“舞”等字的“竖”画,刚健遒劲。用墨温润,由浓逐渐到淡到枯,流畅自然,一气呵成。章法跌宕,正如《春雨杂述》中说:“一篇之中,虽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极,如鱼鸟之有鳞、凤以为之主,使人玩绎,不可名言。”疏密相当,作品《沁园春·雪》中的“长城内外”到“山舞银蛇”多数则“疏”;而“欲与天公”到“江山如此多娇”则“密”,表现了我国古代绘画理论“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艺术特点。形神兼备,作品《家和万事兴》,字字有形,笔笔有神,布局奇稳,墨趣横生,既有龙腾虎跃之势,又有满目烟云之感,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使观赏者心旷神怡、陶醉于笔墨之中。



袁世凯与近代朝鲜

□ 范阔杰

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到安庆集中。吴长庆本在解亮亮部,解亮亮以自己“不善交接,不愿远出”为由,拒绝了李鸿章的渡江邀请,所部人马多数编入吴长庆的“庆”字营。于是,这帮子弟兵成了吴长庆博取功名最初的政治资本。

淮军的组建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皖省民团从此改变了命运,成为镇压江浙太平军的主力之一,特别是以后的剿灭捻军,淮军更是立下汗马功劳。其将领也都从此开始飞黄腾达,不断地加官进爵。吴长庆率领自己的“庆”字营从上海出发,屡立战功。同治三年(1864 年)六月,曾国全收复南京,太平天国失败。吴长庆奉旨嘉奖,以总兵记名简放,赏力勇巴图鲁名号。

次年,僧格林沁战死,曾国藩奉旨督剿捻军,奏调刘秉璋襄办军务。吴长庆率“庆”字营随刘秉璋转战江苏、河南、山东等地。同治六年,赖文光等率领的东捻军被剿杀。刘秉璋因病去职,亲(庆)军悉归吴长庆统带。李鸿章又将部队 8 营、马队 3 营(含裁撤的“良”字 4 营),共 11 营兵马划归吴长庆统带,攻剿西线捻军。同治七年(1868 年),吴长庆大获全胜,西捻军主力被歼灭。

至此,全国局势基本可控,为祸十七年的战乱基本平息,各地只剩部分散兵游勇有待进一步剿除。吴长庆以军功贯穿黄马褂,换瑚敦巴图鲁名号,并授正一品,不久又加提督衔,后又因“办江防有功,以记名提督补直隶正定镇总兵。吴长庆理应赴直隶正定镇总兵之职,可刚刚上任的两江总督沈葆楨上奏挽留,称:“吴长庆统领庆字十三营,分扎浦口、江阴等处,于沿江一带情形最为熟悉,现在相度形势,建造炮台,该总兵胸有智略,洁己爱民,实为防营中不可少之员。”吴长庆没有履新,留在了浦口,迎来了自己几年前结识的兄弟——袁保庆,也为袁世凯后来的投奔登州留下机缘。

袁保庆(1825 年~1873 年),字笃臣,号延之,咸丰八年(1858 年)中举。袁树三次子,大哥袁保中是袁世凯生父。因保庆膝下无子,袁保中将袁世凯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

早年,袁保庆追随叔袁叔甲三在皖北、河南一带平捻,屡有军功。同治四年(1865 年),河南巡抚张之万保举袁保庆为道员,留河南补用。浙江巡抚马新贻力奏朝廷,让袁保庆赴浙江补用。但二人的好意均未被吏部批准,反以同知,发山东补用济南府。同治七年,马新贻升任两江

总督,再次力保袁保庆赴江苏办江防,终被军机处议准,钦封江宁盐法道,住署南京。袁保庆便带着家眷子侄到南京履任,与吴长庆隔江分驻。两人及家眷时常互访,过从甚密,情义渐浓。据吴长庆的孙女、后追随孙中山加入国民党的吴若男回忆,她曾在爷爷府中见过这位大不了自己几岁的长辈,印象中,袁世凯还认了她爷爷吴长庆做干爹。

袁保庆在江宁盐法道任上干了大约四年多时间,这时袁世凯的年龄应该在十到十四岁之间,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初成之时,很多传记作家,把此时的袁世凯说成是纨绔子弟,混世恶少,以当时袁保庆和袁世凯的社会地位,文字记载生平事迹的东西非常有限,以上观点的出处就不得而知了。袁世凯从小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不像其他孩子那样乖巧,那么爱读书应该是肯定的,但指责其本质上有恶环,断不至于。吴长庆没有任何科场功名,完全靠军功博取高官厚禄,嗣父虽有举人出身,但是能做官做到道员靠的还是戎马征战的经历和功勋。即便是袁家两个进士出身的长辈,最终也都是因军功而飞黄腾达的。袁甲三,因剿捻而成为封疆大吏,官拜漕运总督;袁保恒初

起于随父亲剿捻,终成于追随左宗棠西北平叛,督办粮台,官至刑部右侍郎。有身边这些鲜活例子做引导,加之袁世凯对八股制艺先天的愚钝和抵制,少年袁世凯就像今天上学偏科的孩子一样,迷恋武运军功,鄙视闹场制艺也属正常。

据《容庵弟子记》记载,袁世凯在南京时已精于骑术,再烈的马,亦能轻松控制。袁世凯在南京时的塾师叫曲沼,是位举人。除《容庵弟子记》中的只言片语之外,史料中查不到关于此人的更多资料,只知道曲沼不仅学问好,还擅长武术。这正合袁世凯的口味,袁世凯跟随师傅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于是,袁世凯更加重武轻儒。

同治十二年(1873 年)6 月,袁保庆病逝于任所,终年 48 岁。吴长庆、刘铭传等亲自过江,帮助袁家的孤儿寡母操办丧事,处理善后事宜。

(未完待续)

投笔从戎

八、兄弟重逢

吴长庆(1829 年~1884 年),字筱轩,谥武壮。其父战死后,以难荫世袭云骑尉。失去父亲卵翼的吴长庆,没有了依靠和支撑,开始经历风雨和孤独。

安徽江南南北团练虽然办得如火如荼,但因各自为政、互不相容,并没有形成很强的战斗力。故来,他们尚能同仇敌忾,共驱之;故去,则你争我夺,大闹家窝内讧。在众多团练队伍中,以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刘铭传、董凤高、周盛传、周盛波兄弟带领的三支队伍最为强悍,他们分别占据“三山”(周公山、大潜山、紫蓬山),时常挫败来犯的敌人,所以,太平军将领常以“勿犯三山”相告诫。但终究还是一盘散沙,难成什么大气候。

1859 年,英翰出任合肥知县,他带着有限的僚属和兵勇从寿春出发,抄小路前往合肥,沿途多是太平军占领区,英翰被追得狼狽不堪,终于到了治所地附近。但在实力就是一切的战乱时代,周盛波、刘铭传等并不买这位县太爷的账,将他拒之门外不予接纳。最终,落魄的英翰在肥西王

